

澳大利亚的 中等强国外交

崔越 / 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Press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
(批准号: 16CB-05)

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外交

崔 越 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中国·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外交 / 崔越著. —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663-1723-0

I. ①澳… II. ①崔… III. ①外交—研究—澳大利亚
IV. ①D8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6528 号

© 2016 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外交

崔越著

责任编辑: 强晓洁 胡晓雪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 10 号 邮政编码: 100029

邮购电话: 010-64492338 发行部电话: 010-64492342

网址: <http://www.uibep.com> E-mail: uibep@126.com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印装 新华书店经销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16 印张 305 千字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63-1723-0

定价: 49.00 元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一个中等强国的分析框架	13
第一节 中等强国概念的历史演变	14
第二节 中等强国的分类与界定	17
第三节 中等强国理论与分析框架	28
第二章 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实力分析	35
第一节 人口、领土的分析	36
第二节 经济力、军事力的分析	58
第三节 非物质性实力的分析	77
第三章 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认同分析	93
第一节 工党“中等强国外交”的确立与发展	94
第二节 保守党中等强国认同的形成与演变	105
第四章 地缘安全路径与澳大利亚的联盟行为	115
第一节 地缘安全的理论路径	116
第二节 澳大利亚二战后的联盟行为	121
第三节 案例分析 1：伊拉克战争的参战问题	128
第四节 案例分析 2：同盟框架下的澳日准同盟	136
第五章 功能主义路径与澳大利亚的地区行为	147
第一节 功能主义的理论路径	148
第二节 澳大利亚二战后的地区行为	153
第三节 案例分析 1：争取南太平洋地区的无核化	160
第四节 案例分析 2：澳大利亚与亚太经合组织	171

第六章 行为主义路径与澳大利亚的多边行为	181
第一节 行为主义的理论路径	182
第二节 澳大利亚二战后的多边行为	190
第三节 案例分析 1: 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	199
第四节 案例分析 2: 凯恩斯集团的出色表现	205
第七章 中等强国维度下的中澳关系	213
第一节 中澳两国的相互认知	214
第二节 特定意义的双边关系	224
第三节 政策建议及启示	229
参考文献	234
后记	250

导 论

一、研究的问题及其意义

国际政治中的大国中心现象由来已久。自近代国际体系形成以来，大国就如同电影中的主角，占据大量戏份，成为所有目光的焦点。然而，如果按照沃尔兹的标准，冷战后只有美国一个国家在经济、军事和科技几个方面都卓然超群，堪称超级大国。^①世界上近两百个独立国家中，算得上大国的屈指可数，其他的 180 多个国家都只能归入“非大国”一类。在这一类国家中，有人口超过 2 亿的印度尼西亚，也有人口仅有 2 万的太平洋岛国帕劳；有陆地面积 909 万平方公里的加拿大，也有 700 平方公里的新加坡；有 GDP 总量达到 2.6 万亿美元的法国，也有仅 39 亿美元的斐济。^②显然在“非大国”的类别中，存在多个层次的国家。

联合国安理会最初是按照大国政治的原则设计的，在联合国筹建和战后国际秩序形成的过程中，两个非大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依据它们在二战中的贡献，要求在新秩序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它们的主张得到了一些中型国家的响应，这些国家共同促成了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安排。这一中等强国现象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中等强国研究从此发端。

中等强国是一类值得关注的国家，它们在“非大国”的实力排序中处于上端，中等强国概念的建构更刺激了这些国家去建立和践行中等强国外交的意愿。如果说小国由于受到实力的限制，缺乏必要的外交资源去设定和实现自己的外交目标，那么中等强国则掌握着一定的外交资源，有能力去设定和达成特定的外交目标。可以说中等强国是国际关系中的活泼元素，具有发生反应所需要的能量，也具有发生变化的更多可能性。在众多中等强国之中，澳大利亚与中国同处西太平洋，并在这一地区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它的对外行为方式必定影响

① John Ravenhill, “Cycles of Middle Power Activism: Constraint and Choice in Australian and Canadian Foreign Polici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2, No.3, 1998, p. 310.

② 世界银行 2012 年的数据，<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views/variableselection/selectvariables.aspx?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到中国外交,乃至整个地区的格局。对澳大利亚外交的研究理应获得更多的关注,甚至享有特殊的地位。

在基于不同实力数据指标而得出的中等强国的排序中,澳大利亚排名都很靠前。同时澳大利亚的各届政府也明确提出“中等强国外交”的理念,并以此为指导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外交成就。也就是说无论从实力还是从认同方面衡量,澳大利亚都符合中等强国的标准。如果可以确定澳大利亚是一个中等强国,那么就应当可以用中等强国的逻辑去解释它的对外行为。可是在对澳大利亚学者和外交官的访谈中,笔者发现“中等强国外交”在澳大利亚是一个具有特殊含义的语汇,只代表澳大利亚工党所奉行的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积极行动主义的外交路线。而在二战后,澳大利亚工党的执政时间其实远远短于保守党。如果澳大利亚始终是中等强国,那么“中等强国”视角应该也可以用来分析保守党治下澳大利亚的对外行为。而现有的中等强国的理论角度只能解释工党政府而无法解释保守党政府的政策行为,应该是这一理论有所缺失或者是对理论的应用存在问题。

然而,长期以来中等强国研究始终处于国际关系研究的边缘地带,澳大利亚的平易(Jonathan Ping)博士在本世纪初进行他的博士论文的研究和写作的时候,总结道:“学术界对超级大国和大国进行了大量研究,扩展、解释和论述了这些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作用……专门研究中等强国的论著却寥寥无几:这方面的研究十分有限,也比较分散。”^①笔者分析,中等强国研究始终难以摆脱不理想状态的原因在于它没能解决两个核心问题:(1)什么样的国家是中等强国?(2)确定这些国家的中等强国身份有什么意义?这两个问题都涉及中等强国理论的功用问题,即它能否有效地圈定中等强国的范围,以及能否对分析中等强国发挥效用。现有的中等强国理论既没能就界定中等强国的标准以及具体的操作方法达成共识,也很难就中等强国作出任何预测。这令人们对“中等强国理论”的功用产生了怀疑,没有功用的理论当然会遭到抛弃。

虽然现有的中等强国理论算不上是真正的理论,但是它提供了一些从不同角度切入去研究中等强国的理论路径。这些研究路径究竟有何功用、如何能够发挥这些功用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本书的设想是,不同的理论路径具有不同的功用,有的路径适于界定中等强国,而有的适于解释中等强国的行为;如果某一路径不能完成界定或者解释的任务,那么不同理论路径的组合使用也许可以。另外,解释是预测之外的另一种功用,如果这些理论路径能够解释中等强国的行为,也就同样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于中等强国的理解,有利于我们获得更为完整的认识。

^① Jonathan H. Ping, *Middle Power Statecraft: Indonesia, Malaysia, and the Asia Pacific*,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5, p. 1.

因此,本书选择以中等强国的理论路径作为分析工具,剖析澳大利亚二战后对外行为的内在逻辑。为此设定了以下研究问题:澳大利亚二战后的对外行为是否存在一个中等强国的逻辑?如果存在,这个逻辑支配下的澳大利亚对外行为显现出哪些倾向性?现存的中等强国理论包含哪些主要的研究路径?它们怎样能用于判定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身份,并分析澳大利亚的对外行为?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外交能为中国外交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在中澳关系未来的发展中中国如何借力于澳大利亚?

首先,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对中等强国理论进行整理、分类和应用。现有的中等强国理论存在若干不同的角度,有的根据国家的实力数据确定中等强国的范围,有的通过特定行为特征来定义中等强国,有的则从中等强国的地理位置入手解析它们的政策立场。这些理论角度显得分散而杂乱,并且随着近来中等强国外交“积极行动主义”的减弱而归于沉寂,因此被一些学者认为缺乏发展的空间。本研究系统地整理几十年来主要由国外学者所进行的中等强国理论研究,辨识不同的中等强国理论角度的功用,展示如何在它们之间建立起联系,并应用于分析某个中等强国。

其次,研究的学术意义在于对于中等强国概念的厘清与重建。中等强国始终是一个不具有准确内涵与外延的模糊概念,本文在整理前人对中等强国界定的众多路径的基础上,提出了由实力和心理两个维度去界定的方案。两个界定维度都从中等强国在体系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作为切入点,一方面从相对客观的标准去衡量一国的国家实力,另一方面从主观、认同的方面去分析一国对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来定位中等强国。这一界定方案兼顾了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更为科学和全面。另外,这一界定还将中等强国这一国家身份与国家的对外行为联系起来,基于实力与认同的中等强国表现出更为主动、清晰的中等强国对外战略。这是对战略理论内容的丰富,有利于对中等强国战略行为的分析。

此外,只有通过从多个中等强国理论的视角去全面解读澳大利亚的对外行为,才能够加深对澳大利亚外交的认知。中国学者对澳大利亚外交的研究比较有限,多限于对澳大利亚外交史上某些重要事件的回顾。二战前的研究重点放在澳英关系上,二战后则是澳美同盟关系,放大了澳大利亚外交依附性的特点。由于缺乏系统的研究,中国国际关系领域对于澳大利亚如何捍卫国家利益、如何参与国际社会缺乏足够的认知。而在多数澳大利亚学者的理解中,“中等强国外交”是一个具有特殊含义、带有党派和意识形态色彩的语汇。他们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澳大利亚始终是一个中等强国,而只有工党执行“中等强国外交”。揭示澳大利亚在二战后的对外行为中贯穿着一个中等强国的行为逻辑,是对现有认识的颠覆,它将修正对于澳大利亚外交所存在的认识偏差。

本研究符合中国外交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国外交一直有重视大国关系的传统,这也符合本世纪初提出的“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外交布局。^①然而,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强大,美国在相对实力有所下降的情况下对中国实行战略紧逼。在这种复杂的新形势下,中国需要与更多国家进行更为深入和有效的互动,而在国际影响力上仅次于大国的中等强国有潜力成为这一复杂趋势的主要对象。发展同中等强国的外交关系需要在知识上和认识上有所准备和应对。

二、研究现状

从研究目的来看,中等强国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中等强国的国别研究,即以中等强国作为分析角度考察一国的外交政策、对外行为的研究;中等强国理论研究,即以建立以及推进中等强国理论为核心目的的研究。这两类研究存在一定的重叠和交织,因为在第一类研究中,学者们也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中等强国理论发展的成果;而在第二类研究中,为了建立一个中等强国理论或者检验一个理论,一些国家被选作案例,以便确定理论的适用性。

中等强国的国别研究涉及诸多国家,加拿大在其中占有首要和特殊的位置。加拿大是中等强国概念以及理论的发源地,不仅研究加拿大外交的学者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加拿大政治家、外交部和外交官在这一过程中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战后一段时期里,加拿大几乎被等同于中等强国,加拿大外交的所有方面都被冠以中等强国之名。由于这种情况,加拿大作为中等强国的研究则为数众多。从人的安全到战略文化,从大国关系到公共外交,从本国外交部的内部发展到发挥国际影响力,其方方面面都与其中等强国身份相联系。^②“大多数加拿大外交政策分析家都认为加拿大对其中等强国身份的自我认同堪称其战后外交政策的核心指导原则。”^③

① 《杨文昌特派员在香港中华总商会发表演讲》,2004年9月2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mfa_chn/wjdt_611265/zwbd_611281/t431879.shtml.

② Lloyd Axworthy, "Canada and Human Security: The Need for Leadership,"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52, No. 2, 1997, pp. 183-196; Stéphane Roussel, Charles-Alexandre Théorêt, and Susan M. Murphy, "A 'Distinct Strategy'? the use of Canadian Strategic Culture by the Sovereignist Movement in Québec, 1968-1996,"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59, No. 3, 2004, pp. 557-577; Veronica Kitchen, "Smarter Cooperation in Canada-U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59, No. 3, 2004, pp. 693-710; Evan Potter, "Canada and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58, No. 2, 2003, p. 43; John Hilliker, "Middle Power in Perspective: The Historical Section in Canada's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66, No. 1, 2010, p. 183; Andrew Cohen, "Seize the Day,"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58, No. 2, 2003, p. 139.

③ Rob Huebert, "Canada and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52, No. 1, 1996, pp. 69-88.

像德国、日本、英国这些有时不被纳入大国范畴的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包括像挪威、瑞典这样经济实力超群的较小国家,都被作为中等强国的候选对象,进行了多方面、多纬度的研究。^①显然,学者们认为中等强国是研究这些国家外交的有用角度,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总结出中等强国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哪些特征或者行为特点。

近年来,一些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近来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地区大国成为了中等强国国别研究的新热点。韦恩·赛尔彻(Wayne A. Selcher)主编的《国际体系中的巴西:崛起的中等强国》是较早从中等强国角度研究巴西的著作。^②安德烈·库珀(Andrew Fenton Cooper)的《优势外交:冷战后的中等强国》中不仅包含了加拿大、挪威、澳大利亚、瑞典这些传统的中等强国,还述及马来西亚(“马哈蒂尔的马来西亚:崛起的中等强国?”)、阿根廷与墨西哥(“中等强国与美洲地区主义:阿根廷与墨西哥的案例”)、土耳其(“土耳其:新秩序下的中等强国”)以及南非(“南非:理解楼上与楼下”)等。^③

新兴中等强国中获得较多关注的两个国家是南非和韩国,前者是非洲大国,后者是上升迅速的亚洲国家。^④这些对非传统中等强国的研究拓宽了中等强国研究的视野,同时由于这些国家与传统中等强国具有较强的异质性,使得过去的中等强国理论的解释力显示出更大的局限。因为它们加入,中等强国的对外行为呈现出广泛的多样性,并且冲淡了中等强国行为的理想主义色彩,更加凸显了国家

① Max Otte, "A Rising Middle Power? German Foreign Policy in Transformation, 1988-1995," ProQuest, UMI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 1997; Mika Kamei, "Japan, Canada, and the U.S.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Progra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iddle-Power Relations with a Superpower," ProQuest, UMI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 2011; Donna Lee, "Middle Powers in the Global Economy: British Influence at the Kennedy Trade Round," ProQuest, UMI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 1997; Ronald Martin Behringer, "Middle Power Leadership on Human Security," ProQuest, UMI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 2004.

② Wayne A. Selcher, *Brazil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Rise of a Middle Power*, Westview Press, 1981.

③ Andrew Fenton Cooper, *Niche Diplomacy: Middle Power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Macmillan, 1997.

④ See Janis Van Der Westhuizen, "South Africa's Emergence as a Middle Power,"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19, No. 3, 1998, pp. 435-455; Eduard Jordaan, "Barking at the Big Dogs: South Africa'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e Middle East," *The Round Table*, Vol. 97, Issue 397, 2008, pp. 547-559; Charalampos Efstathiopoulos, "Middle Powers and Combative Diplomacy: South Africa in the 2003 Cancun Ministerial Conference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Diplomacy & Statecraft*, Vol. 23, No. 1, 2012, p. 140; Era James Hamill and Donna Lee, "A Middle Power Paradox? South African Diplomacy in the Post-Apartheid Er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5, No. 4, 2001, pp. 33-59; David Hundt, "Middle Powers and the Building of Regional Order: Australia and South Korea Compared," *Korea Observer*, Vol. 42, No. 1, 2011, pp. 69-94; Sangtu Ko, "Korea's Middle Power Activism and Peacekeeping Operations," *Asia Europe Journal*, Vol. 10, No. 4, 2012, pp. 287-299; Kil-Joo Ban, "The ROK as a Middle Power: Its Role in Counterinsurgency," *Asian Politics and Policy*, Vol. 3, No. 2, 2011, pp. 225-247; Gilbert Rozman, "South Korea and Sino-Japanese Rivalry: A Middle Power's Options within the East Asian Core Triangle," *The Pacific Review*, Vol. 20, No. 2, 2007, pp. 197-220.

利益在其政策行为中的重要性。

相对于中等强国的国别研究，另外一些中等强国研究试图总结和建立中等强国的相关理论。但是中等强国理论是一个令人存疑的或者说至少是存有争议的提法。如果说这种理论主张一个国家属于中等强国，因此它就会有某种对外行为，那么很容易找到反例。约翰·雷文希尔（Johan Ravenhill）在《中等强国积极行动主义的周期性：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外交政策的局限和选择》一文中所表示出的忧虑正说明了这一点。^①另外，在现存文献中运用“中等强国外交”一语的情况比较随意，多是指行为主义中等强国理论所关注的国际主义、和平主义、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如卡尔·昂格雷尔（Carl Ungerer）研究中等强国冷战时期在军控方面的外交用到了这一概念，但未对其做任何界定。^②

国内中等强国研究则起步较晚。马宁 2013 年载于《当代亚太》的《中等大国的分化与概念重塑》是少见的由中国学者撰写的系统介绍中等强国理论并通过排序得出中等强国范围的期刊论文，并从发展和资源流动的角度解释了中等强国范围的扩大。^③更多的学者则从中国外交的需要和布局出发，主张中等强国作为一个国家类别理应获得更多的关注。^④更多文章则反映出中国学者对某些与中国外交更具有较强相关性的中等强国的关注，其中韩国由于其地缘位置、朝鲜半岛局势以及中等强国认同的强烈则受到最多的关注。^⑤很多中等强国的国别研究与一般的对外关系研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在研究中将某些国家的中等强国身份作为先验的事实提出。而中等强国理论研究由于无法对这个国家群体的行为作出规律性的总结而陷入困顿，实际上连确定哪些国家是中等强国也是有困难的。要继续推进中等强国理论的发展必须解决功用问题，即这一理论能用来做什么。

① John Ravenhill, "Cycles of Middle Power Activism: Constraint and Choice in Australian and Canadian Foreign Policies,"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2, No.3, 1998, pp. 309-327.

② Carl Ungerer, "Influence without Power: Middle Powers and Arms Control Diplomacy during the Cold War," *Diplomacy & Statecraft*, Vol. 18, No. 2, 2007, pp. 393-414.

③ 马宁：《中等大国的分化与概念重塑》，《当代亚太》，2013 年第 2 期。

④ 丁工：《中等强国的崛起与中国外交布局的调整》，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政治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12 年；唐纲：《中等强国参与全球治理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12 年；丁工：《中等强国与中国周边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7 期；金灿荣、戴维来、金君达：《中等强国崛起与中国外交的新着力点》，《现代国际关系》，2014 年第 8 期；戴维来：《中等强国集团化的理论研究——发展趋势与中国应对》《太平洋学报》，2015 年第 2 期。

⑤ 凌胜利：《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效果为何有限？》，《太平洋学报》，2016 年第 2 期；凌胜利：《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演变：从卢武铉到朴槿惠》，《当代韩国》，2015 年第 1 期；刘雨辰：《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动因、目标与策略》，《国际论坛》，2015 年第 3 期；丁工：《土耳其中等强国外交的现实性和可能性》，《阿拉伯世界研究》，2012 年第 5 期；戴维来：《印度尼西亚的中等强国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东南亚研究》，2015 年第 4 期。

澳大利亚学者对本国外交的研究中,比较系统的是以时间为坐标,以五年或十年为期限的系列著作,如“国际事务中的澳大利亚”(Australia in World Affairs)系列,分门别类地论述每一个时期澳大利亚外交的主要方面、主题,以及同主要相关地区、相关国家的关系。^①独立分散的这类著作则更多,如保罗·迪布(Paul Dibb)的《澳大利亚八十年代的对外关系》,每个年代都有类似的著作。^②期刊文章则有“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中的问题”(Issues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系列、“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视角”(Perspectives o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系列,等等。

澳大利亚外交研究中有两个方面可以说是长盛不衰的重点,第一个研究重点就是被喻为澳大利亚外交“基石”的澳美同盟关系。这组双边关系不仅涉及澳大利亚外交的历史,更牵涉其深层的价值判断、其政府与民众的国家认同、其外交自主性问题。怎样坚持与发展澳美同盟,何种政策能够最好地发挥澳美同盟的效力,在多大程度上与美国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这些都成为争论不休的主题。科勒尔·贝尔(Coral Bell)的代表作《依赖的盟友——一个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研究》,基于其早期任职于外交部的经历和敏感,提炼出题中所显示的这个重要的主题。^③《忠诚的危机》则深刻揭示了在美国实力下降背景下,澳大利亚日益上升的不安全感以及澳美同盟给澳大利亚带来的困惑。^④

第二个研究重点是澳大利亚与亚洲地区的关系,揭示出澳大利亚由其本身的地缘位置而形成独特的“自我”意识和安全意识,亦反映出作为中等国家的澳大利亚也将外交的重点放在地区上。这方面的著作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面向北方:澳大利亚参与亚洲的一个世纪》和《大陆的漂移:澳大利亚寻求地区身份》。^⑤迈克尔·卫斯理(Michael Wesley)的《霍华德悖论》,探讨了存在争议的霍华德政府在对亚洲国家关系上易被忽略的成就。^⑥

集中从中等强国角度研究澳大利亚外交,即使在澳大利亚学者中也比较少见。

① 该系列每五年出版一本,由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组织编写,汇集每个时期有影响的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的文章。

② Paul Dibb, *Australia's External Relations in the 1980s: The Interaction of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Factor*, Canberra: Croom Helm Australia, 1983.

③ Coral Bell, *Dependent Ally, a Study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④ Bruce Grant, *The Crisis of Loyalty: A Study of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Sydney: Angus and Robertso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Austral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72.

⑤ Peter Edwards and David Goldsworthy, *Facing North: A Century of Australian Engagement with Asia*, Carlton South, Vic: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2004; Rawdon Dalrymple, *Continental Drift: Australia's Search for a Regional Identity*,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3.

⑥ Michael Wesley, and Corporation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The Howard Paradox: Australian Diplomacy in Asia, 1996—2006*, Sydney: ABC Books for the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2007.

《澳大利亚对外政策中的“中等强国”理念》一文是其中具有代表性和较高价值的一篇。它指出了中等强国的理念其实不是只属于工党政府的，自由——国家党联盟政府同样认同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身份。^①安德烈·库珀、金·诺索尔（Kim Nossal）与理查德·西哥特（Richard Higgott）三位作者在《中等强国的再定位》一书概括出的“新行为主义”为行为主义中等强国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它的阐释是以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外交为主要内容的。^②1997年出版的《优势外交：冷战后的中等强国》一书集中体现了中等强国理论在冷战后的发展，澳大利亚是其中等强国的代表国家。^③进入新世纪，针对陆克文（Kevin Rudd）上台后所提出的“富有创造力的中等强国外交”，马修·苏塞克斯（Matthew Sussex）和马克·比森（Mark Beeson）都提出应当冷静应对新形势下重塑中等强国积极行动主义所需面对的挑战与局限。^④另外，有些著作涉及澳大利亚如何在某些国际问题上发挥其中等强国的作用，但论述中并无集中提及中等强国理论或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身份与其行为之间的关联。^⑤

与加拿大的情况有些类似，澳大利亚中等强国身份与中等强国外交也是由其政治家的接受而使之得以发扬光大的。在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加雷斯·埃文斯（Gareth Evans）明确界定和丰富了这一理念，积极践行并使之扬名世界。在《从伊瓦特到埃文斯：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中的工党传统》中，埃文斯为工党政府的外交政策找到三个主题词：“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积极行动主义”，认为这三个“主义”在不同时期的工党政府政策中如同草蛇灰线，时隐时现。^⑥在埃文斯来看，这三个“主义”在基廷政府时期达到了最高潮。埃文斯的著述颇丰，尤其是在《澳大利亚在90年代世界中的对外关系》一书中对于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界定、外交目标的设定，以及对于澳大利亚中等强国身份的认识、中等强国外交如

① Carl Ungerer, "The Middle Power Concept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s & History*, Vol. 53, No. 4, 2007, pp. 538-551.

② Andrew Fenton Cooper, Kim Richard Nossal and Richard A. Higgott, *Relocating Middle Powers: Australia and Canada in a Changing World Order*, Vancouver: UBC Press, 1993.

③ Andrew F. Cooper, ed., *Niche Diplomacy: Middle Powers after the Cold War*, London: Macmillan, 1997.

④ Matthew Sussex, "The Impotence of Being Earnest? Avoiding the Pitfalls of 'Creative Middle Power Diplomac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5, No. 5, 2011, pp. 545-562; Mark Beeson, "Can Australia Save the World? The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of Middle Power Diplomac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5, No. 5, 2011, pp. 563-577.

⑤ Richard Leaver and David Cox, eds., *Middling, Meddling, Muddling: Issues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St. Leonards, N.S.W.: Allen & Unwin, 1997.

⑥ David Lee and Christopher Waters, et al., *Evatt to Evans: The Labor Tradition i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Allen & Unwin, 1997.

何能够有效达成都进行了精辟的总结。^①这些无疑有助于我们了解澳大利亚决策者的角度与想法。

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早期比较关注澳亚关系,很多学者的重点是历史研究,主要发表在历史学刊上。张秋生的《澳大利亚卷入越南战争及其对澳亚关系的影响》和《战后初期伊瓦特的亚洲协调政策与澳亚外交经贸关系的发展》是这方面的代表。^②近来,从国际政治和外交的角度对澳外交政策的研究有增加的趋势,例如侯敏跃探讨了澳大利亚外交战略在亚太地区寻求新定位的演变;王传剑聚焦澳大利亚与东亚合作;黄忠、唐小松完整地梳理了澳大利亚公共外交的发展;刘德海分析了陆克文“亚太共同体”倡议失败的原因。^③值得提出的是,汪诗明为澳大利亚外交中一些具体案例提供了有价值的整理和分析,如朝鲜战争、伊拉克战争、柬埔寨和平进程等。^④但是关注澳大利亚中等强国外交的比较少,唐晓松与他的学生宾科共同发表的《陆克文“中等强国外交”评析》算是一例,宾科还完成了《澳大利亚“中等强国外交”述评——聚焦陆克文政府外交政策》的硕士论文,首先引入和介绍了澳大利亚中等强国外交的历史渊源。^⑤肖洋则从“中等强国”的角度去解析澳大利亚的安全困境以及安全战略。^⑥

在中澳/澳中关系方面,早期研究两个国家间历史的专著不多,有代表性的有1985年由澳大利亚学者E. M. 安德鲁斯撰写的《澳中关系史》和尼古拉斯·托马斯(Nicholas Thomas)主编的《重新定位澳中关系》。^⑦从澳大利亚的角度,1989年

① Gareth Evans and Bruce Grant, *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World of the 1990s*, Carlton, Vic: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② 张秋生:《澳大利亚卷入越南战争及其对澳亚关系的影响》,《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张秋生:《战后初期伊瓦特的亚洲协调政策与澳亚外交经贸关系的发展》,《世界历史》,2007年第5期;张天、张静抒,《赫·维·伊瓦特与澳大利亚独立外交》,《世界历史》,2004年第4期。

③ 侯敏跃:《论战后澳大利亚亚太外交战略的演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王传剑:《澳大利亚与东亚合作:政策演进及发展趋势》,《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年第1期;黄忠、唐小松:《澳大利亚公共外交探析》,《国际观察》,2012年第4期;刘德海:《陆克文亚太共同体倡议之研析》,《国际论坛》,2010年7月。

④ 汪诗明:《朝鲜战争与澳英关系》,《史学集刊》,2009年5月第3期;汪诗明:《澳大利亚与柬埔寨的和平进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2月11日,第7版;汪诗明:《澳大利亚参与伊拉克战争原因探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⑤ 唐小松、宾科:《陆克文:“中等强国外交”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0期;宾科:《澳大利亚“中等强国外交”述评——聚焦陆克文政府外交政策》,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⑥ 肖洋:《一个“中等强国”的战略空间拓展——“印-太战略弧”视阈下的澳大利亚安全重构》,《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1期。

⑦ E. M. Andrews, *Australia and China: The Ambiguous Relationship*, Carlton, Vic: 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 1985; Nicholas Thomas, *Re-Orienting Australia-China Relations: 1972 to the Present*,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4.

的风波是两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金·诺萨尔（Kim Richard Nossal）专门关注事件后澳大利亚的反应以及对澳中关系的影响。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关注某些时期中澳关系的走向，如丁念亮、王明新、侯敏跃等学者探讨霍华德政府在中美之间的平衡策略对中澳关系的影响，汪诗明撰文分析了陆克文工党政府怎样使中澳关系遇冷。^①

总结起来，“中等强国外交”基本上被等同为工党对外政策行为的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积极行动主义，成为具有意识形态含义的政党政治的工具。还没有学者尝试从中等强国的角度去解释澳大利亚外交中的其他重要行为，例如联盟行为。如果澳大利亚是一个中等强国，它在不同时期都是中等强国，它的行为逻辑应当涵盖联盟行为。而国内学者对于澳大利亚外交的关注近年来呈现出上升趋势，但仍然不多见，更鲜有从中等强国的角度切入的。中等强国理论所面临的瓶颈以及中国国内在澳大利亚研究中未从中等强国角度切入的缺失，是本研究的动力所在。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

在抽象的哲学方法论层次上，本研究未遵循科学实证主义的规范做法，而接受了人文主义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立场。科学实证主义强调一组变量之间的单线因果关系，以创建新的理论（包含概念/变量、规律及因果机制解释）或检测、应用某个业已存在的这种理论为要务。^②人文主义则侧重于解释、诠释以及深度描述一个现象发生、形成的过程，在其自身的环境中去进行解释和理解，还将诠释者本身的因素考虑在内。本书主要考察了澳大利亚作为中等强国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独特位置对其对外行为产生的影响，以及在这一影响过程中所具有的多层次、多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符合人文主义从多角度、多层次去描述与理解国际政治现象的主张。一国在不同时点、不同情况下的对外行为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笔者认为人文主义能够更好地反映该种复杂性，更符合本研究的性质。

就论文具体的分析方法而言，本研究使用了以下方法：

1. 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方法既具有一定的概括性又具有很好的解释力，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被广泛地接受和使用。这里涉及戴维·辛格（David Singer）层次分析法的国际体系和民族国家两个层次。体系-结构路径和体系-心理路径是从体系层次切入去

① 丁念亮、王明新：《霍华德政府时期澳大利亚在中美之间的平衡策略》，《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2期；侯敏跃：《霍华德执政以来的澳美同盟和中澳关系》，《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4期；汪诗明、王艳芬：《新工党执政以来中澳关系波折之原因探析》，《外交评论》，2010年第6期。

② 这里理论一词的用法，是按照肯尼思·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所严格界定的“对规律的解释”，即解释为什么存在某种“恒定不变”的联系，或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参见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 17.

看待中等强国，功能主义、地缘安全和行为主义路径则属于国家的层次，聚焦于国家的对外行为。

2. 历史分析法

第三章主题是澳大利亚中等强国认同在二战后如何形成和发展的，从历史纵向的角度梳理这一认同发展演变的轨迹。历史分析法是国际政治理性主义思想传统所推崇的经典研究方法。以史为鉴，我们只有从历史中学习，才能更好地认识现在和把握未来。如把历史分析法与国际关系学理论方法相结合，则能够对研究问题作出更为完整与合理的解释。

3. 案例分析法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中等强国理论的功用问题，因而对于澳大利亚对外行为的分析就是一个大的单一案例。另外，在论文四至六章选取了六个小案例来具体观察澳大利亚的联盟行为、地区行为和多边行为，探讨行为的动因以及效果。克里弗德肖认为，案例研究方法专注于完整地描述现象，并强调现象发生的过程以及产生的结果是其所在场景下所有因素的结合。^①本研究采用案例分析的原因正在于此，将案例作为澳大利亚外交的一个单位的整体来进行分析与理解。案例如同将研究对象制作成切片，这切片包含有实际对象的各种要素，相对完整统一，容量又小到可以在一个研究项目下进行足够细致的剖析。本文使用了多个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单一案例研究过于具化、覆盖面小的缺憾。每一章选取两个不同领域的案例，也是希望得出的结论覆盖得更为全面。

4. 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

本研究以定性研究方法为基础，试图合理结合定量研究方法。在测量澳大利亚国家实力的部分，在人口、领土、经济、军事、外交资源等方面将澳大利亚与大国、其他中等强国相比较的数据，具有定量研究系统、客观的优越性。在展示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力图说明这些数据的含义，是定量与定性方法相结合的尝试。

就创新点来说，首先本书针对中等强国概念的模糊性对其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整理和分析，提出一个全面、科学的界定中等强国的方案。其次，在整理现存中等强国理论角度的基础上，提出这些理论角度的不同功用。有的理论角度适用于界定中等强国，而有的理论角度适用于分析中等强国的对外行为。这一分类在过去的中等强国研究中是没有的，它既解决了对中等强国界定的难题，又有利于总结出中等强国的行为特点。

本研究还在中等强国身份与中等强国对外行为之间建立联系，通过澳大利亚分析中等强国在对外行为上的倾向性，这在以往的中等强国理论研究中没有得到

① 蒋建忠：《印象理论与外交政策分析》，复旦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20页。

很好的解决。由于缺乏对主观意识层面的考量,过去以实力数据为基础的中等强国研究被迫停留在对于某些国家的实力数据分析上面。然而具有相似国力的国家以及政府,在其外交政策行为的表现上并不具有一致性或者相似性,其解释力就产生了问题。本研究从实力和认同两个方面界定中等强国,弥补了这一缺陷,能够大大提升对于中等强国对外行为的解释力。

另外,现有的对澳大利亚中等强国外交的理解局限在工党的外交路线和对外行为上面,中等强国的理论路径无法解释保守党的外交路线与对外行为。然而,澳大利亚无论是谁执政,它始终是一个中等强国。本书通过建立一个立体、多元的中等强国分析框架,能够涵盖工党和保守党的外交路线以及对外行为,并对二者的分歧给予合理的解释。

四、主要内容与章节安排

本书的论述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一、基本概念与理论分析框架;二、确立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身份;三、解释澳大利亚二战后的对外行为;四、对中澳关系的启示。具体章节安排如下:

导论分为四个标题:首先提出研究问题,并介绍研究的学术意义;其次对国内外关于中等强国和澳大利亚外交的研究进行回顾,提出现有研究的缺失;再次归纳本文的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最后,也就是本标题,总结论文的框架与章节安排。

第一章首先用第一节来梳理中等强国概念的发展演变,为本研究中使用该概念确立现代国际政治的语境;第二节讨论中等强国的范围与分类,并进一步在全面检视中等强国界定现有标准的基础上,提出本书对中等强国的界定方案;第三节分析与整合中等强国理论的主要研究路径,提出本书的分析框架。

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从实力和认同两个方面判定澳大利亚是否符合中等强国的标准,其中第二章详细分析了澳大利亚的各项物质性以及非物质性实力,第三章分别分析澳大利亚工党和保守党的中国强国认同,以及该认同形成以及发展的路径。

接下来,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从中等强国理论的地缘安全路径、功能主义路径和行为主义路径分别解释澳大利亚二战以来的联盟行为、地区行为和多边行为。每一章都介绍了该理论路径的内涵、对澳大利亚对外行为进行回顾及分析,并提供两个不同领域的典型案例。

第七章回到中国外交的研究出发点,探讨在中等强国视域下中澳两国如何认知对方,在行动中如何发展这一双边关系,还就中国外交如何在未来设定对中等强国澳大利亚的战略作出了建议。